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08JJD710021) 系列成果之一

哈佛大学的 中国共产党研究

路克利 著



*Stud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Harvard University*

山东大学出版社

哈佛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研究

路克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佛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路克利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607-4554-1

I. ①哈…

II. ①路…

III. ①中国共产党—理论研究—美国

IV. ①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0166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720×1010 毫米 1/16 11.5 印张 186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序 一

路克利先生为完成其北大博士学位,于过去一年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进行研习。一年来,他十分勤勉,翻遍了研究中的所有藏书资料,并向其他学者借阅个人所藏,同时还四处采访、搜集所写人物的相关信息。在其母校山东大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他不仅联络山东大学与费正清中心召开了研讨会,而且将费正清中心过去五十年的历史记录翻译成中文。因此我十分乐意应他之邀为本书撰写序言。

如读者们所见,本书主要记录在哈佛大学进行中国研究的学者们,从费正清一直到今天的学者,特别是记录他们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方法。我曾向路先生指出,尽管哈佛的费正清确实毫无疑问是现代中国研究这一领域的领军学者,但那只是在中国研究刚刚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研究方向的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而 60 年代的领军者则是哥伦比亚大学,70 年代是密歇根大学,80 年代之后则出现了实力均衡、强强竞争的状态。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十分荣幸能够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他们也很清楚,路先生完全可以选择聚焦其他许多大学的小型研究中心,毕竟如今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优秀学者在美国学术界分布广泛。

路先生的项目是不同文化之间思想传播的又一范例。^①这与中国人一百多年前所做的研究不同。当时的学者们努力审视西方,以求找到外国人能够侵略强大华夏帝国的原因,弄清楚为什么他们能够使清王朝于 1911 年彻底瓦解。今天的中国很强大,中国取得了“财富与权力”,中国人民过上了

^① 对此过程和问题的细致研究,请详见本杰明·史华慈的《寻求财富与权力:严复与西方》(哈佛大学贝拉纳普出版社 1964 年版)。

有史以来最幸福的生活。中国的成功使得一些亚洲人和非洲人开始猜测：在发展上应当摒弃“华盛顿共识”，推崇“北京共识”。他们想知道中国的发展模式能否复制。

但是，在中国，对于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研究仍然很热门，这不仅是因为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依然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更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想要辨明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本质、它的强势与弱点以及它的国际政策的走向。在这些研究中，路先生的研究极为与众不同：他不是单纯地去探寻美国学界本身的样例，而是要记录一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费正清和史华慈如果知道有这样的研究，一定会表示欢迎，并很高兴看到路先生对于他们的看法的阐释。现在，我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十分期待看到他的研究在中国引起的反响。

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历史学教授、
哈佛费正清中心原主任、政府系原主任
麦克法夸尔

2011年9月26日

序 二

路克利同学曾在山东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是我的校友。后来他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读硕士,我虽然不是他的导师,但我曾给他讲过课,所以他又是我的学生。他因曾在地方政府部门从事翻译工作,具有较好的外语基础,所以在校期间,他专注于海外中共党史和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的研究工作,完成了硕士论文《试析麦克法夸尔中共史研究——以〈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为例》,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哈佛大学中国共产党研究学术史中的一些问题。2008年他进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近年来,他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党的文献》等学术期刊发表了多篇这一领域的论文,还翻译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2010年他被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哈佛大学学习。此书是他在外学习一年期间写成的。通读全文,我认为该书有以下特点:

一、创新性。在学术界率先提出了海外中共学等提法。国内党史学界早就有一批学者从事海外中共党史学术史的研究工作,路克利同学经过几年的摸索,提出了海外中共学的概念,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证,这是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二、系统性。国内学界对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很少,该书对费正清、史华慈、麦克法夸尔等哈佛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其学术范式和方法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例如哈佛学者研究中国的“刺激—反应”模式、“隐退回归”模式、“冲击—突破”模式、“铁三角”模式等分析模式,并分析了“克里姆林宫学”等方法,对于我们了解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资料性。该书使用大量的一手材料,较为深入地发掘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学术史。可以看得出,他阅读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较好地利用了哈佛大学丰富的学术资源。他使用的一些材料来自哈佛大学档案馆,有些在国内学术界还是首次使用。

当然,路克利同学在材料的把握上仍然有值得商榷之处,有些观点的论证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完善。他还很年轻,相信他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会有更大进步,取得更可喜的成果。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
郭德宏

2011年9月6日

目 录

引 论	(1)
海外中共学的兴起	(3)
哈佛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影响	(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31)
哈佛学派对“毛主义”若干问题的研究	(33)
哈佛学派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系的研究	(44)
哈佛学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研究	(51)
费正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6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共理论自主性	(69)
哈佛学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西文化互动视角	(78)
哈佛大学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模式的研究	(86)
党史党建研究	(97)
哈佛学派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有关问题的研究	(99)
哈佛学派对延安时期中共党建的研究	(115)
麦克法夸尔与海外中共学研究	(124)
费正清 1946 年对国共两党和中国政治的分析	(134)
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研究	(143)
哈佛大学学者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特点的分析	(145)

哈佛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与中美关系	(154)
参考文献	(167)
后 记	(176)

引 论

海外中共学的兴起^①

海外中共学是西方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窗口。这门学科的兴起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中心的成立为标志,以费正清、史华慈、麦克法夸尔等几代学人为代表。纵观其学术史,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教学,不但有了相对庞大和稳定的专业队伍,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而且取得了具有较大学术和社会影响的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已发展成为海外中共学这一新兴学科。这门学科的学者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从这个角度讲,海外中共学也可称为“国际中共学”。研究海外中共学,应当树立和增强学科意识。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不久,就逐渐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1924年,曾参加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写作了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1926年,苏联人葛萨廖夫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介绍了中共早期情况。1932年,美国外交官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给美国国务院报送了《共产主义在中国——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向美国政府介绍了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的发展情况。1937年,斯诺(Edgar Snow)所著《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让西方社会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

^① 本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本文由作者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学期间完成,已经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

正形象。1938年,伊罗生(Harold R. Isaacs)所著《中国革命的悲剧》在伦敦出版,披露了早年中国共产党的艰难曲折经历。1947年,美国新闻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贾安娜(Annalee Jacoby)撰写出版了《中国惊雷》一书。此类著作向美国公众生动地介绍了中国革命。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后来在西方国家传播开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海外学界关于中共的研究开始兴起。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海外学术界实际上形成了海外研究中共的一门新兴学科——海外中共学,或称为“国际中共学”。这门学科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为中国共产党有关问题,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对象;研究队伍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等学者为主要代表,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和教学群体;其研究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一、海外中共学的形成以哈佛大学东亚中心的成立为标志

早在抗战时期,费正清就与中共有着较多的接触。他当时是美国的外交官和情报官员,此前曾在哈佛大学任教,是一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通过与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等人的接触,又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费正清已经感觉到国民党政府没有前途,建议美国政府转变对华政策。1955年,为了开展对中共政治经济政策的研究,在费正清等人的建议和推动下,哈佛大学设立了中国政治经济研究项目,当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新执政的共产党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动向,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供咨询。这是在西方顶尖学校成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中国和中共的科研机构。随后五十多年里,中国研究项目和中国学(中共学)研究机构培养的博士分布到美国各地乃至西方国家一流大学,从事新中国和中共研究。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立五十多年来几经变迁。1955~1957年间称为“中国经济政治项目部”;1957~1961年间称为“东亚中心”;1961~1977年间称为“东亚研究中心”;1977~1991年间称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2007年夏改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五十五年间,从东亚研究中心分离出了日本研究所、朝鲜研究所。中心成立后,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很快成为海外中国学和海外中共学的研究中心,世界各地知名学者来这里进行学术交流。如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并表彰施拉姆(Stuart R. Schram)在毛泽东研究中的杰出贡献,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于当地

时间 2003 年 12 月 5~7 日召开了题为“毛泽东再认识”(Mao: Re-evaluated)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 年 5 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知名学者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改革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成立迄今,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一直是海外中共学的学术中心。

哈佛大学东亚中心成立时,海外中共学学者已经出版了大量的研究中共问题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费正清、史华慈、布兰特(Conrad Brandt)师徒三人合作编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等都是海外中共学的开山之作。20 世纪 40 年代曾访问延安的美国著名记者和评论家艾特金森(Brooks Atkinson)认为,《美国与中国》一书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中国的最好的书”^①。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是这些学术作品的重要内容和学术特色。这些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经典学术作品也标志着海外中共学的形成。

二、海外中共学学科有了一支较为庞大的专业研究和教学队伍

海外中共学形成五十多年以来,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有从事中共问题研究的学者,有专著出版的知名学者已有上百位。一代宗师费正清为美国的中共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人才。1987 年费正清八十岁生日的时候,费正清中心工作人员列出的和费正清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生有一百一十多位,这些人多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成为美国中共学研究的骨干。其中,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和柯伟林(William Kirby)成为哈佛大学的骨干,余英时和林培瑞(Perry Link)等人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骨干,莫菲(Rhoads Murphey)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等人成为密歇根大学的骨干,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等人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骨干,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艾凯(Guy Alitto)等人成为芝加哥大学的骨干,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成为哈佛中心的骨干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现任执行主任欧立德(Mark Elliott)的博士生导师是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魏的导师是列文森(Jo-

^① John K. Fairbank,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xii.

seph Levenson),而列文森也正是费正清的学生。费正清为美国的中共学培养了几代学人。在有关中国问题的新闻界也有费正清的学生,如白修德等人。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老师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也是费正清的学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中国研究中心担任中国治理与政治项目主任的著名中共研究学者赛奇(Tony Saich)也曾在费正清中心访问研究两年。在北美研究中共的著名学者还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齐慕实(Timothy Cheek)等人;在欧洲有剑桥大学的方德万(Hans J. van de Ven)、维也纳大学的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等人;在澳洲有泰维斯(Frederick C. Teiwes)等人。有的学者有多重身份,既是政府官员,也是大学教授,如密歇根大学的所罗门(Richard Solomon);有的大学教授曾从事有关中共的新闻工作,也曾在政界任职和智库任职,如麦克法夸尔。这些学者很多以“中国通”著称,他们的研究领域相对宽泛,但对中共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还以中共研究为主,因此,把其中一些学者称为“中共通”则更为合适。

从事中共研究的科研教学机构不断壮大。现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理事会成员就有三十七位知名教授,另外还有众多的博士后研究员、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施拉姆 20 世纪 60 年代曾两度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有关中共问题的博士后研究,其早期代表作《毛泽东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就是在东亚中心研究的课题。除了费正清中心外,在美国,还有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中国项目、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学院中国项目、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亚洲研究会等。在加拿大,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在欧洲,有伦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剑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知名机构。在澳洲,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中心。除了大学外,还有政府机构、智库、新闻界,以及情报机构等。政府机构,如美国国务院;智库,如美国兰德公司(Rand)、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新闻界,如新闻记者白修德、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科研教学机构的研究和教学对象主要是相对广泛的中国问题,但有关中共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当多的教学科研机构,尤其是著名大学,开设了有关海外中共学的课程。如哈佛大学政府系麦克法夸尔教授在哈佛大学开设了“文革”和“中国政治”等课程,非常受欢迎。“文革”课程学期选课人数曾达到四百多人。

三、海外中共学具有自己的学科对象,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果

海外中共学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为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对象。海外中共学者出版了大量的有关中共的研究著作,较为知名的专著千种以上。仅哈佛东亚研究书系(1956年设立该项目,已出版三百多种)、哈佛当代中国研究书系(1985年开始出版,已出版二十种)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果就有上百种。也有很多学者对中共的研究成果包含在中国学成果之中。海外中共学学者遍布西方国家主要大学和科研机构,著书立说,互相切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

1. 海外中共学学者中共研究问题领域较为集中,已经形成较为独立的学科对象

(1)中共与国民党的比较研究,主要是探讨为什么美国会失去中国,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一类问题。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是困扰美国政界学界的一大难题。在当时美国关于中共为什么在中国胜利的论战中,费正清认为中共的胜利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而外部的因素不是很重要。费正清在《中国新史》中对中共和国民党进行了比较分析,也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性格进行了对比分析;他当时甚至希望美国政府和民众能够理解中国共产党。因此,他在麦卡锡时代曾受到调查。

(2)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有关中共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费正清、史华慈等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一系列观点。1950年,史华慈在哈佛完成了博士论文《毛泽东崛起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Communism in China until the Rise of Mao Tse-Tung*)。这篇论文提出了“毛主义”^①的概念,并研究了“毛主义”的基本特征。费正清在《中国新史》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indigenization)包括行动风格和

^① Benjamin Schwartz. *Communism in China until the Rise of Mao Tse-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hD thesis, 1950, p. 138.

思想风格两个方面”^①，“毛泽东在知行合一方面比他的同事们高出一筹，这一原则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一个主旨”^②。以费正清、史华慈为代表的中共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史华慈、施拉姆、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曾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阿普特（David Ernest Apter，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等人对“毛主义”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施拉姆早在1963年就提出：“中共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③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也分析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演变。麦克法夸尔提出了“中共意识形态危机论”。牛津大学赫德逊（G. F. Hudson）1957年发表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Communist Ideology in China）^④等研究成果，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中共的指导思想。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出版了《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Mao Tse-Tung*），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思想关系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等著作。赛奇对中共思想史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作品，如《毛泽东中国的革命话语》（*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China*）。

（3）中共党史问题研究。1948年，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1版问世之时深受各界称誉，旋即成为经典著作。该书第二部分为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描述，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麦克法夸尔等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主要以中共的重大政策演变为线索，叙述讨论新中国建立后的党的历史发展。《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名为国史，而实则更像党史，尤其是第二卷。早在195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费正清、布兰特（Conrad Brandt）和史华慈编写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专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他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共成立史的研究。1960年，

① John K.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78.

② John K.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02.

③ 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p. 112.

④ G. F. Hudson. Communist Ideolog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3, No. 2 (Apr. 1957), pp. 176, 184.